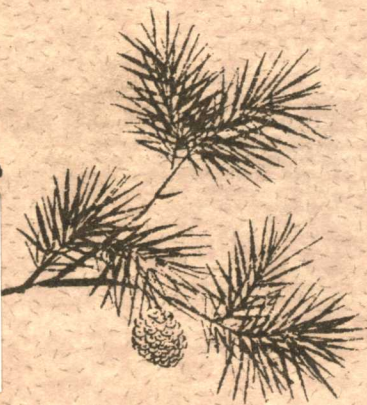


古典诗词名家

高启诗选

李圣华

选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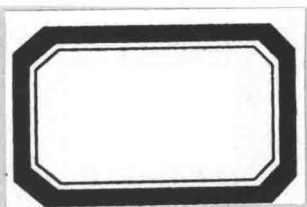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

高启诗选

（明）高启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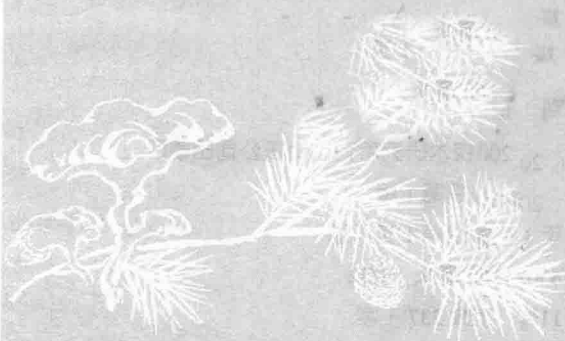


高启诗选

李圣华

选注

古典诗词名家



中华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高启诗选/李圣华选注.-北京:中华书局,2005

(古典诗词名家)

ISBN 7-101-04355-0

I.高… II.李… III.古典诗歌-作品集-中国-明代
IV.I222.74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79480 号

书 名 高启诗选

丛 书 名 古典诗词名家

编 著 者 李圣华 选注

责任编辑 张 耕

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

(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)

<http://www.zhbc.com.cn>

E-mail: zhbc@zhbc.com.cn

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

版 次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开本/850×1168 毫米 1/32

印张 11 $\frac{3}{4}$ 。字数 237 千字

印 数 1-4000 册

国际书号 ISBN 7-101-04355-0/I·573

定 价 19.00 元

出版说明

诗词是中国古典文学传统最深厚、最具魅力的形式之一,由于它充分体现了汉语的特点,兼具文学性与音乐性两大艺术特质,以简约的形式蕴涵了丰厚的韵味,所以一直受到作者与读者的青睐,其社会参与的广泛程度是其他形式难以比拟的。时至今日,诗词在海内外仍拥有大批爱好者:自发成立的众多业余创作团体,大量的相关读物,为数众多的诗词网站,无一不在昭示着这种古典形式在新时代的强大生命力。

在长达千年以上的发展过程中,经由社会各阶层无数爱好者的不断实践,特别是通过一大批天才作家示范性的工作,诗词较好地解决了继承与革新、规范与灵活等艺术矛盾,成为表达思想、抒发感情的便利工具。人们或浅吟低唱,或慷慨高歌;或率尔操觚,或精雕细刻,尽情倾吐他们对人世的种种感受,留下用心血甚至生命写就的诗词篇章。诵读这些篇章,犹如穿越时空的隧道,步入历史,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对话,总能带给我们丰富的人生感受和审美体验。

中华书局过去出版了许多古代文学作品的总集、别集。精选历代诗词名家的名作,汇聚最新研究成果,为社会提供一套兼具学术品位和可读性、雅俗共赏的系统诗词选本,一直是我们的夙愿。为了达成这个愿望,我们特意邀约了全国二十多家单位的三

十多名专家学者,编撰了这套“古典诗词名家”丛书。我们的做法是:一、以传诵程度作为作品入选的首要标准,同时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。二、选文尽量使用权威版本,特别是权威的整理本,不出校勘记,一般异文不作说明,重要异文在注释中加以说明。三、每种书正文前设“前言”,对入选的作者、作品及其他相关内容作较全面、精到的评介。四、作品及其注释按编年有序,不能编年的作品集中放在编年作品之后。五、每篇诗词正文下设“题解”和“注释”,题解根据具体情况对诗的写作背景、主旨、作法、艺术特色及涉及到的人名、地名、年号等方面做出介绍;注释则针对一般读者的切实需要,特别注意对典故、名物、典制等专有词和难懂语词的解释,生僻字加注汉语拼音,难懂的句子有串讲。

我们希望读者朋友通过阅读这套书,对中国文学史上优秀的诗词作家、作品能够有比较充分、系统的了解,在精神上产生共鸣,增加人生的兴味和体验;或者得到学习、仿效的榜样,有益于诗词的创作,那将是对我们莫大的鼓励。

最后,衷心感谢参与撰稿的专家学者,在这套丛书编撰的过程中,他们都竭尽全力,无私地做出了自己的奉献;其中几种选本所经历的艰辛,更远非心血二字可以概括。同时,希望读者朋友多提宝贵意见,以使这套书能在将来进一步得到完善。

中华书局编辑部

2004年9月

前

言

元明之诗，一盛于元初，以南宋遗民与元好问诸大家标举赤帜，继之有刘因、虞集诸家；二盛于元末明初，以倪瓒、杨维桢、高启、刘基等人风华冠绝一代；三盛于明中叶，以李梦阳、何景明、王世贞等人领袖群伦；四盛于晚明，徐渭、袁宏道、钟惺、陈子龙等人号召文坛。在元明诗歌史上，高启是最杰出的诗人之一，陈璋《大全集序》称高启诗流传数百年，“冠于明，胜于元”；《四库全书提要》谓高启“天才高逸，实居明一代诗人之上”，都真实地体现了高启在诗史上的地位及其诗歌的价值。

一

高启(1336—1374)，字季迪，号青丘子，又号槎轩。祖父名本凝，父名一元，字顺翁，生二子一女，长子咨，次子启。在父亲去世后，高启很早便开始管理家中的薄产，“综理家政”(吕勉《槎轩集本传》)。他性警敏，读书过目成诵，究心群史。嗜好诗歌，出语清新俊逸。至正十六年，张士诚据吴，亟请饶介出任淮南行省参政。饶至吴中，与名士颇有唱和。闻高启才名，使人反复召之始至。张羽、高逊志、唐肃、余尧臣、吕敏等人相继来吴，与高启、王行、杨基、徐贲卜居相近，结社北郭。大约在至正十八年前后，高启移家青丘

里,依岳父周仲达而居,往来青丘与北郭之间。以其才华,加上饶介的力荐,高启谋得一职,当不是困难的事,然而他却选择了隐居林下的人生道路。至正十八年到至正二十年间,高启数次游吴越,足迹到达绍兴、杭州、湖州等地。他的游历显然不是为了访友或者游幕,更不是为了经商而奔波,由于缺乏具体的文献记载,我们无从确切得知他出游的原因了。根据其《吴越纪游诗序》所说的“余尝游东南诸郡,顾览山川”,我们推测他曾一度欲游观东南形胜、吊怀古迹。乱世中的山水留给他的毕竟只是满目的凄凉,使他怆然悲歌:“征途嶮巇,人乏马饥。富老不如贫少,美游不如恶归。浮云随风,零落四野。”(《高青丘集》卷一《悲歌》,本文所引高启诗均据《高青丘集》,以下再标出)此后,除应征往南京外,高启再未远游。北郭诸子的唱和,时断时续。至正二十三年张士诚称吴王后,北郭结社受到不小的冲击。不过,北郭结社受到最大冲击还是在平江之战后。至正二十七年,朱元璋占领平江,徐贲、余尧臣、杨基谪临濠,高启避乱江上,张羽、吕敏隐居不出,北郭结社遂废。

洪武元年,高启卜隐江上,决定终老此生,《秋日江居写怀七首》其四:“终卧此乡应不憾,只忧飘泊尚难安。”(卷十五)诗句真实地传述了他的心声。高启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。洪武元年八月,朱元璋命学士詹同等十人分行十道,访求贤哲隐逸。九月下诏求贤。十月又遣夏元吉等分行天下,访求贤才。十二月诏修《元史》。高启虽然年轻,但他的才名和史学造诣受到时人的推许。洪武二年,征修《元史》,高启来到南京,与宋濂、王祎、汪克宽、胡翰、宋僖、陶凯、陈基、曾鲁、赵汴、张文海、徐尊生、黄篪、傅恕、王琦、傅著、谢徽、赵壖一起在天界寺修史。八月史成,进呈御览,高启因留京师教功臣弟子。翌年二月授翰林院编修。七月,朱元璋召对,擢授户部侍郎。高启力辞,给金币放归。高启复居青丘,洪武四年

移居虎丘，未几卜居城南，以授蒙谋生。洪武五年十月，礼部主事魏观出为苏州知府。魏观与高启结识于南京，深重高启的才华，到苏州后与高启往来甚密。洪武六年，魏观修复曾被张士诚占为王官的苏州府治旧基，高启为作《郡治上梁文》。蔡本、张度等人诬魏观似有“异志”，词连高启。洪武七年九月，高启在南京弃市，年仅三十九岁。

据《钱塘高氏族谱》记载，高启家族系出渤海，世为开封人，随宋室南渡到钱塘，后移至吴门，居苏州北郭。《明史》、《列朝诗集》等文献均称高启长洲人。人们多信此说。偶有持异议者谓高启里籍在吴县，但这种说法未能引起广泛的关注。我们认同高启是吴县人的说法。其《送顾式归吴》云：“顾君野王孙，与我生共县。”（卷七）顾野王（519—581），字希冯，吴县人，仕于陈，累迁黄门侍郎，光禄卿。高启的诗句可为一则明证。另外，高启诗文从未自称长洲人，《志梦》一文谈到长洲谢徽，称“同郡”，而非“同邑”。称呼长洲王行，未曾用过“同邑”一词，而王行悼念高启的文字也称“同郡”。陈璋《高太史大全集序》署曰“长洲旧史陈璋序”，亦未用“同邑”一词。因此，准确地说，高启里籍在吴县，而非长洲。

二

在元末，高启、刘基、宋濂都写了一些关注元朝政治，乃至颂扬元朝的文字，尤其是宋濂的诗文。三人在明初更写了大量颂圣和赞扬新朝的文字。对此，历代评论家有不同的看法。或因此质疑他们写于元末的诗文是否出于真实的感情，或对他们的品德提出疑问。其实，前人对此早已提出辩驳，游潜《梦蕉诗话》：“青田刘伯温，论者称其乘时佐命之功，炳机克终之道，甚与汉子房相似。然

或谓子房乃为韩报仇,伯温则尝委事于元,其出处不免有音,是盖未深论也。夫伯温生元世,岂能超出天地外,不为元人也哉?忧时痛国,每形于辞。”诚如其言,高启与刘基一样渴望元朝能够“中兴”,改变积贫、积弱、积弊的局面。至正十八年,高启在《送张贡士祥会试京师》沉痛地写道:“国家文治今百年,多士孰赉皆知天”,“迩来国运属中圯,争慕死节羞生全”,“坐令王纲复大正,乾枢共仰天中旋”,“我今有志未能往,矫首万里空茫然。”(卷十)正是由于持这一政治观点,至正十七年,张士诚接受元朝的招安,被封为太尉时,高启及北郭诸子对他颇产生了一些好感,高启在《代送饶参政还省序》中称赞说:“太尉镇吴之七年,政化内洽,仁声旁流,不烦一兵,强远自格,天人咸和,岁用屡登,厥德懋矣。然犹不自满而图治弥厉,尚惧听览之尚阙,而思僚佐之相裨也,乃承制以淮南参政临川饶公领咨议参军事。公辞以非材,即躬临其家,谕之至意,公感激,遂起视事。呜呼盛哉!此岂偶然也耶?盖天将兴人之国,则必赉以聪明奇特之士,与之左提右挈,以就大事,故其相合之深,相信之笃,冥契默谕,有莫知其所以然者。”(《凫藻集》卷三)《游天平山记》还发表评论说:“今天下板荡,十年之间,诸侯不能保其国,大夫士之不能保其家,奔走离散于四方者多矣,而我与诸君蒙在上者之力(指张士诚),得安于田里,抚佳节之来临,登山以眺望,举觞一醉,岂易得哉!”(《凫藻集》卷一)这种好感,大抵持续到张士诚自称吴王之际。张士诚的叛而复变使北郭诸子深感不安,张羽、徐贲等人相继隐去。陈友谅欲联合张士诚对抗朱元璋,张士诚则首鼠两端,碌碌无为。高启进一步认识了张士诚的目光短浅,此前抱有的幻想彻底幻灭了。怨愤与指责之情后来都写入了《吴官感旧》、《兵后出郭》等诗中,尖锐批评了张士诚的夜郎自大、胸无大志,表示了痛恨和不齿之情。陈祉斋《高启诗选》认为:

“诗人对张士诚这位起义英雄还是有好感的”，“诗人在吴的十年中，过着比较适意的生活。”其实，这种评论是不全面的。

我们毋庸就高启期待元朝中兴、蔑视群雄，而论其思想保守。高启不惮于讥刺帝王、抨击政治，他的初衷乃在于天下安定，民众远离战争涂炭。他对张士诚的幻想也即在于此，这可以解释他何以未成为张士诚的僚属，同样也能解释他对朱元璋态度的前后变化。《青丘子歌》诗云：“不闻龙虎苦争斗。”龙虎苦斗形容群雄的割据争战，具体指向了朱元璋、陈友谅、张士诚之间纷乱错织的战事。高启不像魏观、刘基、宋濂那样，早早地认定朱元璋是成大事者，有意追随左右。他是以一个“反战”的勇士出现在诗坛的，厌恶一切战争，痛恨战争给民众带来的沉重灾难。宣扬反战和颂扬忠直使他与朱元璋政权保持了相当远的距离。高启对朱元璋的敌视，及在平江之战后所产生的忧惧，是客观存在的。朱元璋徙张士诚旧属及家属、流寓之人二十餘万到金陵，饶介被杀，徐賁、杨基、余尧臣等人流放，给高启带来很大的冲击，他避乱至江上，并非事出无因。高启对朱元璋的这些做法十分不满，在朱明新朝创立后，他的疑虑和忧惧有增无减。所以，洪武二年，他并不想应征往南京与修《元史》，在亲友的劝说下，始踏入征途，出发前他就决定事毕后立即返乡。途中所作的《赴京道中逢还乡友》诗云：“欲寄故乡言，先询上京事。”就充分说明了他的疑虑不安。而这次南京之行，则构成了高启对朱明新朝看法的一个转折。在南京，他感到了天下逐渐太平，战争硝烟正在消逝，他期望十餘年的理想在这里得到实现。论者说他览新朝而兴飞，感升平而高歌，是深中肯綮的。《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》、《赠刘生》、《晚登望都邑官阙二首》、《奉天殿进元史》、《送沈左司从汪参政分省陕西，汪由御史中丞出》、《禁中雪》等诗，或赞太平，或颂圣德，无不发自内心深处，洋溢着

喜悦欣慰之情。值得注意的是,高启的理想发乎此,也止于此。天下已趋于太平,他对个体精神自由的追求则跳出来占据了心灵的主导位置。他在诗中劝说余尧臣“幸逢昌朝勿自弃,愿更努力修嘉名”(《答余新郑》),激励杨基“便应上金銮,立对被天眷”,而他本人则是“秋风楚潮满,归舸帆欲转”(卷七《赠杨荣阳》)。一面鼓励友人力仕新朝,有所作为,一面自示坚决归隐之意,这充满矛盾的诗句确实能够反映他此期的复杂心态。高启奉守达士乐贫的人生信念,轻视功名利禄,向往自由自在,如田间野鹤,一生只负江湖梦,难以忍受樊笼的痛楚,他每每吟唱“江湖浩荡故山远,归梦每逐鸿南飞。”(卷九《喜家人至京》)“自怜观咏者,江湖兴未忘。”(卷七《御沟观鹅》)“我身本是江湖客,偶堕黄尘晓行役。”(卷十《晓出城东门闻槽声》)当然,他一意要辞归,还与看到了新朝的另一面不无关系。陈田《明诗纪事》说高启擢户部侍郎,以不能理天下财赋力辞,“盖亦有托而逃”。所论不无道理。如其洪武二年所作《我昔》云:“发言恐有忤,蹈足虑近危。”(卷六)同年《早至阙下候朝》云:“驺吏忽传丞相至,火城如昼晓寒销。”(卷十七)同年《京师午日有怀彦正、幼文》云:“客愁欲断翻长笑,人事推迁古难料。”(卷十)洪武三年《御沟观鹅》云:“池中鹄可并,廷内鹭难行。”《寓感二十首》其十八云:“人命有通塞,主听无违从。”(卷三)可知,高启的南京生活并不平静,这也难怪他在新朝一派升平的环境下写出许多心态与新朝“离异”的作品了,因此也不难理解他急于离去的心情了。

洪武三年七月,高启回到吴中,如久在樊笼的野鹤,初得自由,引吭高唳,《至吴淞江》:“澄波三百里,归兴与无穷”,“忘机旧鸥鸟,相见莫惊飞。”(卷七)《始归江上,夜闻吴生歌,因忆前岁时》:“愿长把酒听君歌,从此天涯少离别。”(卷十)《迁城南新居》:

“何须许伯长安第，此屋脩然已有馀。”(卷十五)不过，归隐并不能使他完全从悲凉意识中解脱出来，《步至东皋》、《我愁自何来》含混其辞，便抒写了一种不易言说的愁思。诗人的可贵之处，就是无论在乱离的时代，还是在“清平”的时代，都保持着人生的清醒、思考的独立。这是诗人的可贵品质。

三

高启的盛年摧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悲剧。由高启的死，人们很容易想到“初唐四杰”之一的骆宾王，张习《四杰集序》说：“国初，以高、杨、张、徐比唐之四杰，故老言不惟文之似，而其攸终亦不相远。眉庵、盈川，令终如一；太史之毙，同乎宾王；北郭虽不溺海，仅全要领，而非首丘；司丞投龙江，又与照邻无异。噫，亦异矣！”其实，高启的死与嵇康有更多的相似处。高启好友诗人周砥游绍兴，死于兵乱，高启《得亡友周履道记室在系所诗次韵》云：“一篇《幽愤》时时读，风雨寒灯夜独亲。”(卷十四)洪武七年，高启被诬与魏观谋反，押往南京，门人吕勉《槎轩集本传》记载说：“寻有张度御史来，微行廉其迹，以先生尝为撰《上梁文》，王彝因浚河获佳硯为作颂，并目为党，俱率赴京，众汹惧丧魄，先生独不乱，临行在途，吟哦不绝，有‘枫桥北望草斑斑，十去行人九不还’，‘自知清澈原无愧，盍倩长江鉴此心’之句。”高启读周砥系中诗的心绪与读嵇康《幽愤诗》相同，而他临行所咏诗句与《幽愤诗》脉理又何其一致！嵇康受钟会迫害，因友人吕安事系于狱中，后竟被杀。细味嵇康狱中《幽愤诗》诗句：“嗟余薄祜，少遭不造”，“爰及冠带，冯宠自放，抗心希古，任其所尚，托好老庄，贱物贵身。志在守朴，养素全真”，“咨余不淑，婴累多虞。匪降自天，实由顽疏”，可以深入

理解高启的诗魂。

高启的死,是历代评论家谈论高启最多的话题之一。人们对此进行了种种推测:

一种说法是由《郡治上梁文》得祸。吕勉《槎轩集本传》即记载了高启因撰上梁文,牵入魏观“谋反”之事而死。洪武八年二月李志光的《鳧藻集本传》也称高启“遂蹇连以致”。王行在《祭文》中感叹说:“孰主宰是兮,有不可而致诘。惟公论之攸在今,不可得而泯也。”《郡治上梁文》,确是高启直接的死因。《明史》载朱元璋看到高启上梁文,“因发怒,腰斩于市”。此文今已佚失不存,《元和唯亭志》卷十三提到其中有“龙蟠虎踞”之语。与上梁文同时作的《郡治上梁》诗云:“郡治新还旧观雄,文梁高举跨晴空。南山久养干云器,东海初生贯日虹。欲与龙庭宣化远,还开燕寝赋诗工。大材今作黄堂用,民庶多归广庇中。”(卷十五)从中可窥知上梁文的大概内容。这首七律,赞颂朱明新朝和魏观政绩,然而,由于朱元璋的“雄猜”,高启的死难,也成为一种必然。

第二种说法是由《宫女图》、《画犬》诗得祸。这种说法在清代最为流行。钱谦益《列朝诗集》选录《宫女图》,注云:“据《吴中野史》载:‘季迪因此诗得祸,因引《昭示》诸录,及豫章罪状为证。’”《明史·文苑传》也谈到:“启尝赋诗,有所讽刺,帝嫌之未发也。”作为正史,在未有实证的情况下,不好具体言明是那一首诗使朱元璋“嫌之未发”的,但其所指似乎就是这首《宫女图》。徐轨《续本事诗》认为《宫女图》触及到明初官闱的隐私,朱元璋读御史张尚礼《官怨》诗,“以其能摹写官闱心事,下蚕室死”,更何况高启直接披露宫廷秽事呢?清代史学家赵翼以精于史学和考订著称,在《瓯北诗话》中强调《画犬》一诗暗示皇帝荒淫,与《宫女图》俱构成高启获罪之由。清代对此持异论者较少。朱彝尊《静志居诗话》认为《官

女图》一诗，“孝陵猜忌，情或有之”，《画犬》一诗“则不类明初掖庭事”，他还进一步提出疑问：“二诗或是刺庚申君而作，好事者因之附会也。”女诗人和评论家汪端发挥朱彝尊所论，肯定地说：“至虞山（钱谦益）谓以《宫女图》诗触太祖怒，假守魏守之狱，因引《昭示》诸录及豫侯胡美罪状为证；尤西堂（尤侗）作《明史乐府》，有《上梁文》一首咏青丘事，以为文人轻薄，自取杀身。然按《明史·胡美传》，洪武十七年坐法死，二十三年李善长败，帝手诏条列奸党，言‘美因长女为贵妃，偕其子婿入乱官禁，事觉，并伏诛’。考其时，距青丘殁已十馀载，则因诗而死之说，尤为无稽。竹垞（朱彝尊）尝有辩而未甚详，爰为扩其说焉。”此可备一家之说。我们认为，《宫女图》、《画犬》、《红蕉仕女图》、《晋官》四首七绝，嘲讽帝王宫廷淫乱，乃姊妹篇，此征引以作比较：

《宫女图》：“女奴扶醉踏苍苔，明月西园侍宴回。小犬隔花空吠影，夜深官禁有谁来？”（卷十七）

《画犬》：“独儿初长尾茸茸，行响金铃细草中。莫向瑶阶吠人影，羊车半夜出深宫。”（卷十八）

《红蕉仕女》：“蕉花包露月中开，酒渴初寻出迳苔。凭仗小庞休吠影，深官那得外人来？”（《遗诗·七言绝句》）

《晋官》：“尽日南风永巷开，羊车去后玉阶苔。谁知天上无尘地，亦有城南小吏来。”（卷十七）

前三首中的小犬、独儿、小庞，指的是一种长毛的小狗。《画犬》、《晋官》都有“羊车”一词。“深宫”与“夜深官禁”的意思相同，前三首各出现一次，第四首用“天上无尘地”来指代“深宫”。无疑，“羊车半夜出深宫”与“亦有城南小吏来”是解读四诗的关键所在。“羊车”用晋武帝典事。《通鉴》载晋武帝平吴后，颇事游宴，掖庭殆将万人，常乘羊车，恣其所之，官人竟以竹叶插户，盐汁洒地，以引帝

车。“城南小吏”，用贾后典事。“南风”为贾后小字。《晋书·惠贾皇后传》载洛南小吏，端丽美容止，自称路逢一老姬，说家中病人，宜得城南少年“厌之”，于是随去，上车下帷，藏于箱中。开箱后忽见楼阁华屋，香汤沐浴，好衣美食，入见一妇人，年可三十五六，短形青黑色，眉后有疵，留欢数夕。闻者皆知是贾后。高启写皇宫龌龊之事，揭开了君主可怜的遮羞布。这类令统治者深感头疼的诗篇，显然是向神圣皇权的一种挑衅。高启不惮于反复其意，《缶鸣集序》表白：“虽以之取祸，身罹困逐而不忍废，谓之惑非欤？”无论洪武初官廷是否出现类似的混乱，朱元璋读到这类诗句恐怕都要“嗟之”的。钱谦益所论有牵强之嫌，汪端之辩又过分究于一论，盖俱未为信论。轻视皇权和帝王威严，在明初，尤其是在“雄猜”的君主那里，是很容易招致祸事的。

第三种说法在现代较为流行，即高启不与新朝合作，使朱元璋产生迫害之心。高启拒绝朱元璋的垂青，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和隐逸的澹泊。他主张当政者应顺应“人情”，而不恃强权，迫而从之。洪武二年，徐大年参修《元史》，史成，以年老乞还，会修《五礼》，复留之，事成，再固申前请，得返归，高启南京所作《送徐先生归严陵序》发表见解说：“盖先王之为政，莫先于顺人情，亦莫先于厚民俗。力有所不任者，不迫之使必焉，义有所可许者，必与之使有遂，……今之归，其无负于夙昔之志哉！”（《凫藻集》卷二）然而，朱元璋治理朝政，多以暴力推行其所谓的“仁政”，恃极权而逆“人情”。洪武一朝，诛连甚众的大案就有胡惟庸案、蓝玉案、郭桓案、空印案、刘三五科场案等。孟森《明史讲义》说：“死者如此之惨，皆令士夫惧为君用之故。”朱元璋也清楚自己实行的是一种以暴施政的方法，担心士人会消极抵制，遂颁布诏令：“寰中士夫有不为君用者，即有背教，杀而籍没之不为不公。”洪武初，朱元璋以仁君

的面目君临天下,而他“雄猜”的个性未曾掩饰得踪迹全无。高启辞归的第二年,刘基隐退,其中不无相同的想法。高启熟知汉初的历史,古今对比,他心中一直存在忧虑,诗文中每每谈论起君主的宽弘大量,其实这正反映了他内心的不安。《示内》诗云:“且放疏狂醉杯酒,圣恩元许作闲人。”其中就带有一些侥幸的感叹。我们还可把朱元璋强调士为君用与上梁文之事联系在一起认识。朱元璋诛魏观,不久悔之,命致祭,归葬蒲圻。而对高启、王彝等受诛连者却不置一辞。朱元璋并非只是想遮掩“失误”,他心里清楚魏观是忠君的,而高启、王彝游离于新朝召唤之外,本就是不可赦免,诛杀高启还可起到震慑天下士子的作用,何乐而不为呢!

第四种推测与高启早期对朱元璋的态度有关。或认为北郭十友人物如余尧臣、徐贲、张羽、杨基、唐肃等人曾效力于张士诚、与饶介、蔡彦文关系密切,诗文颇多赞扬张士诚,污蔑朱元璋的字句,余尧臣等人还参加了平江的防戍。朱元璋对东南士子产生一种厌弃心理。《吴郡甫里志》卷六《高侍郎季迪传赞》即谈到:“启所撰《青丘子歌》有‘不闻龙虎苦战斗’句,上恶其语。”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。需要说明的是,朱元璋想重用高启时,已经改变了一些成见,高启力辞户部右侍郎,恐怕更是朱元璋迁怒的重要原因。

高启不能忍受政治束缚,他任自由的个性,独立清醒的意识,锋芒毕露的诗文创作,及朱元璋的雄猜、暴戾,都是导致其“玉碎昆仑,兰焚楚泽”(《明诗纪事》)悲剧的重要原因。颜延之《五君咏·嵇中散》咏嵇康云:“中散不偶世,本是餐霞人。形解验默仙,吐论知凝神。立俗迁流议,寻山洽隐沦。鸾翮有时铩,龙性谁能驯。”这首诗也可作为高启短暂人生的写照。高启抗直希古,餐霞隐沦,疾俗忤时,不与世偕,与嵇康一样“龙性难驯”,因此,不为世容,也是一种自然。